

# 论董仲舒的史学思想

郑先兴

(南阳师范学院 汉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春秋繁露》全面地体现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在董仲舒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是各级官员履行职责的是非得失;而其任务是正名即区别行政事务中各级官员的职务和职责,考核其政治能力和贡献。所以,历史学的性质就是政治学,其功用是管理国家政治的锁钥、把握未来和抒发政治抱负的凭借。历史是人类为核心主体的发展过程,而仁义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行使仁义,就是掌握政权要合法,行使政权要合理;需要重用贤能,贤能则需要拿出自己的才智、本领和忠心;要制定制度,赢得民心。历史认识的方式是天人合一:即经过人自身的知识认识历史的叫作“天之副在乎人”,又经过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来把握现实的叫作“人副天数”;其范畴是五行和阴阳;其检验的标准是历史事实、学术讨论和政治实效。天人合一也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包括“善善恶恶”的历史主义方法、将自然与人类两相对照的比较方法、注重圣贤先知先觉的理论分析法和注重历史创造主体的价值分析法。

**关键词:**董仲舒;史学思想;《春秋繁露》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4)01-0006-11

《春秋》是孔子所编著的以鲁国为中心内容的春秋时代史书,《春秋繁露》<sup>[1]</sup>则是以阐发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为鹄的,可以说是全面地体现了董仲舒<sup>[2]</sup>的史学思想的史学论著。可喜的是,在专门研究董仲舒史学思想的论著中,诸如吴怀祺先生所主编、汪高鑫先生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sup>[3]</sup>,以及白寿彝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秦汉卷》<sup>[4]</sup>中,都对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予以了论析,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论述单单论及了天人合一、大一统和三统说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对于具有丰富史学思想的《春秋繁露》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思想史研究的论著中,诸如侯外庐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两汉卷》<sup>[5]</sup>,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sup>[6]</sup>和金春峰先生的《汉代思想史》<sup>[7]</sup>,以及王永祥的《董仲舒评传》<sup>[8]</sup>和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sup>[9]</sup>,等等,虽然都全面地论述了董仲舒的思想和生活,但是对于专门的史学思想来说,显然是不够专业的,也更不

够全面的。由此之故,全面地揭示和论析董仲舒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来说,就有了极为宝贵的机会。

## 一、“道往而明来”的史学论

可能是对于古代史学论著《春秋》的精研,董仲舒对于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论述,显得异常的清晰。

《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矣。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在这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历史学的本质就是遵奉历史规律、学习历史经验。再巧的手没有规矩是不能够画出方圆的,再聪明的耳朵不懂得音符是不能与社会沟通的。历史经验就是人类社会的规矩音符。圣明的人遵奉历史规律,贤惠的人模仿圣贤,

收稿日期:2013-11-25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秦汉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2BLS010;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郑先兴(1961—),河南省南阳市人,历史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则。《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也。”这里的“本末”就是指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学研究事物的过程,抽绎其发展的本质,并予以检讨历史发展的异常情况,通观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行为志向,从而展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如何创造历史的活动,或者说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简而言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春秋繁露·俞序》:“仲尼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根据宣统年间苏州苏兴先生的意见,这里的“探”当为“援”,“正”在“王公”之前;后一个“王公”的“公”当为“心”。如此,孔子编纂《春秋》的目的,最高的目标就是根据天神意志确定王公大臣的政治地位,以及百姓民众的经济诉求,最低的目标就是弄明白过去政治的得失,启用贤能人才,等待后来的圣人。所以,孔子才研究史学,探究过去的历史,确定执政者的得失,体现圣人贤者的仁爱之心。这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政治体制中各级官员的地位关系及其职能,二是据此考究在政治活动中各级官员的履行职责的得失是非。总之,在董仲舒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是各级官员履行职责的是非得失。

《春秋繁露·实性》:“《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义也,真其情也,乃以为名。”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辨别事物的属性并给以相应的名分,任何事物的命名都是以其自身的真实为依据的。真实既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也是主观认识的规范,于是才有了事物的名称。简单而言,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有两点要求,一是事物本身是真实的,二是事物认识的概念范畴是一致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矣。”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辨别事物的属性,并给以相应的名号,名号与事实应该是恰如其分,不能有秋毫之差异,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就是谨慎地赋予事物相应的名号,名号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根据历史实践中的善恶差异来命名的。在这里,董仲舒反复地说明历史学的任务是正名,其本意可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辨别事物的属性,而是指区别行政事务中各级官员的职务和职责,考核其政

治能力和贡献,即所谓的循名责实即正名也。此其一。

《春秋繁露·仁义法》:“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宣传实施仁义的办法。实施仁的办法是爱别人,不是爱自己;实施义的办法是督查自己,不是督查别人。自己如果不能立得正,就是能够督查别人,也不算是义。自己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关爱,就是再怎么自爱,也不算是仁。《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不可以加于至尊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孔子编撰《春秋》就是要告诉那些不知道义理的人什么是义理。比如国家灭亡,那么作为国君就应该殉国,这才是符合义理的。历史所赋予人的性命,其目的是使其实施仁义,明白羞耻,而不是像鸟兽那样只知道活着和谋取私利。所以,历史学遵奉历史规律并顺从人情伦理,指出,那些处于国君尊位的不能受到丝毫的羞辱,否则理应殉国;同样的,那些遭遇到奇耻大辱的人也不可再以国君尊位来看待。所以,失去国君地位的不能再看作是国君;就是重新复国的国君,孔子也没有将其看作是国君了,更何况那些做了俘虏的人,对照义理,肯定不能算是国君了。由此可见,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用既定的伦理观念来评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并借此予以宣扬和批评。此其二。

《春秋繁露·竹林》:“《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研究和历史学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记载历史发展的得失是非,探析其中所形成的原因。这是因为历史的得失是非曲直复杂难以弄清楚,没有历史学的研究和论析是很难搞明白的。《春秋繁露·盟会要》:“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偏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这里的“重”,当为“申”,就是申明、审查的意

思。就是说,历史的得失是非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那些圣人贤者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消除历史的祸患。因此,作为史学论著的《春秋》遍察并记载春秋时代的历史祸患。按孔子的初衷,只有揭示历史祸患的成因,即可消除未来的历史灾患。如果历史平安发展,那么即可训导人们走向行善,各级官员也可清廉执政,太平盛世的局面即可呈现,礼乐制度也可推行。又,《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道,视人所困惑,为立说以大明之。”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解释人们的困惑,为之释疑解难的。由此可见,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探究历史发展的原因,训导人们避难趋乐,使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向和谐太平。此其三。

综上所述,在董仲舒看来,历史学研究政治的发展,其任务就是披露各级官员履行职责、实施仁义的实情,并分析其得失是非。据此而言,历史学的性质就是政治学。《春秋繁露·盟会要》:“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诌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故曰:大矣哉,其号。两言而管天下。”在董仲舒看来,孔子所著的史学论著《春秋》的政治意识是非常鲜明的:其政治立场是明确各级官员的尊卑身份,其政治责任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弱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其实施步骤:一是区分那些违做法违背仁义的原则,并指出规范的做法;二是采用历史经验教训,以矫正那些违背礼仪的行为。在孔子的历史研究中,对于那些好事,无论多小都要予以褒扬;对于那些丑事,无论多小都要予以斥责,凭此来纯化社会历史的美德;为了确定历史秩序、谨慎地区别贤人和不肖之徒,为了吸纳远方的贤者、倡导亲和重用身边的人,为了把握整个中国的历史而以鲁国为个案,明确职责、评价功过都没有脱离历史事实,用公平之心论定是非,并在每个评价中体现着君主的恩泽。孔子的初衷是为了消除祸患,通过明确职责使社会政治有序。所以,历史评价的功能是巨大的。“褒贬”或者说“正名”两个字,就可以管理全国的政治。由此可见,历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其初衷或是其进程,每个步骤每个要素,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就是政治学。

作为政治学的历史学研究,又有哪些功用呢?第一,历史学是管理国家政治的锁钥。《春秋繁露·俞序》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闵子和公肩子

都认为,《春秋》“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作为史学论著的《春秋》言语很深刻,确实是管理国家的最宝贵的资材。“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也。”子夏也说,管理国家的执政者必须阅读《春秋》,否则,不会知道未来以及之前身边所隐藏的危险,更不知道什么是治理国家的权柄,以及作为国君的重要性。又,“《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春秋》所传颂的治理国家的经验,领悟深刻的话即可成为君王,即使领悟浅薄也可以成为霸主。可见,历史学的功用,就是指导人们行政的步骤,以达到取得或维护政权的目标。简单而言,历史学就是人们管理国家政治的锁钥。这是因为历史学以政治发展为其研究对象,以揭示其成败经验为其研究对象。以《春秋》为例,孔子专门论析了其时十二君主的行政得失,为治理国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第二,历史学是把握未来的学问。《春秋繁露·仁义法》:“兵以加焉,乃往救之,则弗美。未至预备之,则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这里的恶“蚤”,根据下文的“故救害而先知之”,当为“害”字。如果遭遇敌军来侵犯才派军救助,不算是好的领袖。但是在敌军来犯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随时防范的准备,这才算是好的领袖。因为提前防范、预警,是救助的最好办法。若提前预警防范,祸患就没有出现的机会,那么,国家也就没有祸患了。但是,问题是怎样在事发之前预警,在动乱和祸害萌芽中将其杜绝和翦灭。这就是作为史学论著的《春秋》的初衷。反过来说,历史学的功用就在于探究历史发展中微小事物的变化,察觉并把握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从而做出正确的对策。《春秋繁露·精华》:“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苏兴援引《管子·形势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诸今。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就是说,只有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从而把握未来。任何事物的发展,虽然具体形态不同,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历史上,同一事物的本质是一致的。只要理解过去,即可推知其现在和未来。《春秋》作为历史学的形式,其功能就是探究过去从而把握未来。

第三,历史学是抒发政治抱负的凭借。《春

秋》所记载的十二君王都是衰落时代的事情,孔子的学生为此很是困惑。《春秋繁露·俞序》:“孔子曰:‘吾因其行事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苏兴训“行事”为“往事”,“此言圣人因衰世往事,加以明王致治之深心,是故世衰而文自治”;“空陈古圣明王之道,不如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知所劝诫”。孔子的初衷,就是凭借历史研究宣泄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君主如何面对动荡时代政治问题提出相对的策略。但是孔子的应对策略不是直接提出,而是通过历史经验的描述让君主感悟和借鉴。又,《春秋繁露·符瑞》说,“西狩获麟”,“然后讬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孔子自听说麒麟被捕获,心存忧郁,于是借助评论春秋时代各级官员的履行职责情况,表明改变制度的意思。孔子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为社会的动荡而忧愁,希望务必消除各种人为动荡的因素。可见,历史学的功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当是评判社会问题、发表政治见解和抒发政治理想的强有力的凭证。

## 二、“春王正月”的历史观

谈到董仲舒的历史观,任谁都会想到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但细读《春秋繁露》就会发现,其实“天人合一”与其历史观关系不大。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任于身。”苏兴训“诚”,“诚,犹实也,言因名以得其实”。董仲舒将人的本性称作是人心,从而认识到人的实质,有着贪婪和仁义两种情愫。贪婪与仁义汇集于一身,其意是说,人有创造历史或者毁坏历史的两种能力,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有着进步或者退步的两种倾向,两种趋势。当然,董仲舒所坚持的,肯定是进步的趋势。《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为仁义,唯人能仁义。”人是自然界长期自然演化的精华,人虽然从自然中生长,但是却有着独自生存的本能,这就是人类独有的行使仁义创造历史的能力。由此,在董仲舒看来,历史是人类为核心主体的发展过程,而仁义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

《春秋繁露·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贪婪和仁义是人类自然的属性,人们常常喜欢美好并讨厌丑恶,所以,在历史实践中,可以培育仁义的品

格推动历史的进步,禁止贪婪的本性防止历史的退步。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怎样才能表彰仁义、推进历史发展呢?

《春秋繁露·立元神》:“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这里的“本”即是指事物的本质,也可以说是历史规律。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只要抓住本质,就可以从心所欲,否则没有人服从。也可以说,要想推进历史的进步,必须遵从历史规律,只有遵从历史规律才可以创造历史,否则是不可能的。又,“君人者,国之本也”;“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君主是政治的根本,其说话做事,对于国民来说都起着引领的作用。换句话说,政治的最高管理者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其言行直接关系着历史是否进步。一方面是历史规律,一方面是最高管理者,两相结合,管理者遵从历史规律,即可创造历史,推进历史进步。

问题在于,怎样做才算是遵从历史规律,才能推进历史进步?

对此,董仲舒予以了反复的论述。《春秋繁露·立元神》将政治原则归纳为天地人三项,提出要“肃慎三本”;《十指》将所有的政治事宜归类为“十指”,提出要处理十项措施;《深察名号》将政治的责任归属于君主,提出“王号”与“君号”各自有“五科”,即有五项职责需要履行。由此,董仲舒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顺从历史规律推进历史进步的基本原则、措施和责任,综其论析,其最为关键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春王正月”问题。《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之所以说王正月,是说君王的政权是接受天神的赐予而得到的。君王得到政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历法,变化服装颜色,制定礼乐制度,所以改制是顺从历史规律。可见,表明政权已经改换了主人,不是继承别人,而是直接受封于天神,其政权的得到是合法的;选择正月即位就职,并改变礼乐制度,表明行使政权是合理的,是顺从了历史规律的。可见,董仲舒的“春王正月”意蕴,一方面是说掌握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春秋繁露·玉英》:“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

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在这里,“正”就是指合法性与合理性;“五者”即“元之深”、“天之端”、“王之政”、“诸侯即位”和“竟内之治”,用今天话说,就是指职权确认、履职时间、履行职责、职权分工与职责目标。这就是说,《春秋》的政治规则就是作为行政最高端的首脑首先是要合理合法地取得政权,选择合适的时间就职,了解自身的职责,明确责任、分工到人,确定并努力实现施政的目标。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正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了解情况,明白身份。另一方面,是说行使政权的规则与规律。《春秋繁露·玉英》:“《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意以随天地终始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春秋》将历史的本质看作是历史的开端,目的是要求人们顺从历史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活动;提出“春王正月”的初衷,也是要求人们顺从历史规律采取相应的活动。《春秋繁露·立元神》:“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人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其职责各具特色。在历史实践中,人们必须依照其特色来分别活动,比如依照天的要求加强宗教信仰的管理,实施孝悌;依照地的要求加强经济财富的管理,丰富衣食;依照人的要求加强制度规范的管理,拟定礼乐制度。如果将天、地两个方面看作是自然历史发展的内容,那么,人方面其实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容。如果从政治内容说,其实就是宗教、财富和制度三项,可以说它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前者是就执政者的主体而言,后者是就执政者的客体而言。明白说来,就是掌握政权要合法,行使政权要合理。一些论者论及于此,说董仲舒有着“大一统思想”,考董仲舒“一统于天下”的原意,是指要将新即位君王的新制度推行于整个社会,虽然有着“大一统”的意思,但不是其思想之主旨,其思想主旨则是指新君王、新制度与新气象。可见,据此夸大“大一统”是不准确的。

二是“鲁季子的问题”。《春秋繁露·精华》记载,鲁僖公即位时,社会还比较动荡,但是鲁僖公任用了季子。当季子活着的时候,二十多年内,“国家安宁”,“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但当季子去世之后,鲁国不能应对邻国的侵扰,向楚国请求援助。可见,季子在鲁国政治中的作用是多么大!“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以

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天下虽然很广大,历史虽然很悠久,但是有一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只要选用贤能之人,将会出现君主尊荣国家太平;相反选用的人如不能担当其职责,那么就是君主受辱国家危乱。这是万代积累的经验,请不要怀疑。可见,董仲舒将任用贤能看作是顺从历史规律的核心举措。“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经过考察历史上的任用贤臣情况,董仲舒认为有三种情形:一是任用贤臣引领国家兴旺;二是不知道也不能任用贤臣,其结果是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三是知道贤臣但是坚决不重用,其危害大的是导致身死国亡,小的是国家动乱。《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上知天文,其行兆未见。其萌芽未生,昭然独见存亡之机,治乱之源,豫禁未然之前,执矩而长,至忠厚仁,辅翼其君,周公是也。”君主需要重用贤能,贤能需要拿出自己的才智和本领,并拿出自己的忠心,如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察危于细微,防患于未然。《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孔子总结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作为君主要任用贤能,这是历史的法则。人们常说,要讲礼重信。讲礼说的是礼尚往来,尊重别人,别人就会以尊重回报;重信说的是知恩图报,施恩惠给别人,别人就会以恩惠回报。所以说,礼尚往来,知恩图报,正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则。可见,在孔子和董仲舒的心中,君臣关系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关系,君主拿出爵禄与臣吏的智能进行交换,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其交换的平台就是讲礼重信。如果一方失礼或者轻信,势必会付出代价的。由此,简单指责董仲舒宣扬君主专制,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是“舜作乐的问题”。《春秋繁露·楚庄王》质疑说,既然改制是表明政权直接来自于天神,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作乐”呢?“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可见,作乐是为了与民同乐,让民众接受新生的政权;作乐是改制的延续,表明君权既神授,又民享。引申可知,天神与民众是一致的,天神不可见,民心殊难违。对于君主来说,其实,民众就是天神。所以,作乐的问题实质

就是得民心的问题。“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赆》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各显其能，制作乐谱，其目的就是赢得民心，让民众感知到他们对自己的关爱。《春秋繁露·玉英》记载，宋繆公虽然继承王位，但是《春秋》很忧心；而卫宣公虽然不是继位之主，但是《春秋》却不担心。其因是卫宣公“能行善得众”，“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可见，《春秋》所谓的天命其实当指的民心。那么，如何赢得民心呢？《春秋繁露·保位权》：“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蹕然相较，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得民心有三部曲，第一步是根据民众的利益诉求设置职位和等级，第二步是根据不同的职位和等级设定其福利层次，第三步是依据民众的功绩给予相应的职位与爵禄。这样，又回到了制礼作乐的话题上了。《春秋繁露·度制》：“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圣明的人看到人们的贪婪本性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于是制定社会制度，确定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上下的差异。并使那些富有的人足以展示其显贵又不至于骄傲，使那些贫穷的人足以能够生活下去又不至于忧愁。又，“故明圣者像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圣明的人制定制度，明确规定享有高等俸禄的人，不能兼并那些享有低等俸禄人的职业，吞并那些小利益，其目的是不允许和民众争夺利益和产业。这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则。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得民心办法，既体现着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又充斥着政治的细节和步骤。旗帜鲜明，策略扎实，可以说是一幅完整的得民心或者说民本思想的画卷。

概括起来，董仲舒认为，作为行政首脑，要遵从历史规律，推进历史进步，其政治的要点有三个：一是根据历史现象的特性予以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二是任用贤能，给予相应的俸禄和地位，让其知恩图报，忠心尽力；三是通过社会地位的贵贱等级差别给予民众以不同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以君主为核心的民众围绕其周围的向心圆，简而

言之就是得民心，或者说是民本思想。可见，董仲舒的历史观是赤裸裸的政治史观，是从春秋政治实践中所得出的比较完备的执政策略或者说行政谋略方案。与其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没有太多的关系。

### 三、“天人合一”的历史认识论

其实，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主要是就历史认识论而讲的。

天人合一的基础，是人们必须认识自然。所以，董仲舒分析了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性及其可能性。《春秋繁露·郊语》说，人们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有很多奥秘，比如磁石吸铁、橘生淮南等等，“夫非人所意而然”，都是人们没有想到的。在生活中，“或者吉凶祸福、利不利之所从生，无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面对着未知的未来，是福是祸，是好是坏，还是更稀奇古怪的现象？如果不是依照人们的意愿出现，该如何是好？由此，董仲舒强调了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提出了历史认识应持的正确态度，即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进而，董仲舒论析了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春秋繁露·观德》：“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天地是万物生长的根源，也是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历史由来已久，未来无疆。但是正如自然万物各有其自身的特质与属性，各以其类，各有其分，人类历史也有着自己的本质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这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条件，人们可以借此认识历史。换句话说，历史事物本身的属性差异，是构成历史认识的客观条件。《春秋繁露·玉杯》论析“赵盾弑其君”的理解，说明原因是赵盾没有捉拿弑君的罪犯，指责他没有尽到人臣的职责。“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任何事物都有与自己属性相同的同类，观察同类的属性，就可以了解该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认识主体通过比较类比，可以认识历史。换句话说，历史认识主体的比较与类比能力，是其能够进行历史认识的主观条件。《春秋繁露·郊语》：“尧为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言察身以知天也。”尧对舜说，历史规律的存在是需要你自己在实践中体验才能了解的。按照董仲舒的理解，只有通过个人的亲身实践，才能够了解历史规律。可见，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但是需要在历史实践中

来实现。又,“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故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人类社会是非成败的规则,都是幽冥难以清晰地认识到的。唯有圣人才能发现。所以,所谓圣人就是指那些具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能力的人。在这里,董仲舒发挥了圣贤史观的特长,认为圣贤同样是具备历史认识的能力的。

既然历史是可以认识的,那么,怎样认识历史呢?换句话说,历史认识的方式是什么呢?

董仲舒认为,历史认识的方式就是天人合一。一方面,历史认识是经过人自身的知识认识历史的,用董仲舒的话说,叫作“天之副在乎人”。《春秋繁露·为人在天》:“人之所以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名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出之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人自身就像自然,其形体四肢三节,像自然的四季三月;其血气畅通,像自然的风调雨顺;其德行的高低,像自然的山川峰峦;其好恶喜怒,像自然的阴晴寒暑;其人生的责任,又像一年四季的运行。其喜怒哀乐也像自然的春秋冬夏。总之,天的缩影就是人。人的性情源自于自然,所以,作为君主,可以借助自身的感受,来认知自然并顺从其变化,正如尧舜那样的圣君顺从自然。也可以说,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感悟来把握历史规律,但是不能随意地臆断猜测。

另一方面,历史认识是经过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来把握现实的。用董仲舒的话说,叫作“人副天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膺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就是说,自然现象浓缩于人的

身躯。人身也像自然。所拥有的数目相互参照,所以其发展的前景也是相关联的。如太阳运转,一年是366天,人的骨节也是366节;一年12月,人的身躯也可分为12份;人的五藏像五行,四肢像四时,眼睛的闭合像昼夜,性情的刚柔像冬夏,哀乐像阴阳,计谋像度数,伦理如天地,等等,能说出数目的,数目相对;数不出数目的,性质相同。总之,自然和人是相同的,其本质是一致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身躯了解无形的自然,查阅有数的东西掌握那些无数的东西。可见,事物的本质可以以类相推知,事物的现象可以用数量来把握。

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其实是想通过自然与人的关系,相互参照,互相认知。《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任何事物都有合乎自己本质的名称,而名称的来源又是人们顺从其自然属性来命名的。可见,自然和人类似乎有别,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其相同的是其本质属性,由此可以互相推知,要么以自然推知人类,要么以人类推知自然。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认识论法则。据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本意是讲的认识论,是说认识论的展开,一方面是人通过感悟自身的知识去认识自然,认识历史;另一方面,人在认识自然和历史之后,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再来认识人类自身。论者常常从本体论上论析天人合一,实际上距离董仲舒的思想原意已经是很远的。

在将天人合一看作是历史认识论的形式之后,董仲舒还对历史认识的范畴比如五行、阴阳等予以了论述。

五行。所谓五行就是以自然界中五种物质如木火土金水五种之间的关系为核心,以此解释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董仲舒承继了这种观点,并且用于阐释社会政治关系和历史发展。根据《春秋繁露》论述五行的文字,可以列出五行及其职能(见表1)。

《春秋繁露·五行对》:“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子,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五行依次相生的关系,正如父子关系。所以,子尽孝道,正如五行相继,符合自然的法则和历史规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表1 《春秋繁露》五行及其职能表

类别	时辰	职能	方位	对象	职责	标志	声貌
木	春	生	左	东方	春气	司农 仁 执规 召公	风 角 貌
火	夏	长	前	南方	夏气	司马 智 执矩 周公	电 羽 视
土	季夏	养	中央	中央	天润	司营 信 执绳 太公	雷 宫 思
金	秋	收	右	西方	秋气	司徒 义 执权 子胥	霹雳 商 言
水	冬	藏	后	北方	冬气	司寇 礼 抱鼓 孔子	
篇章	五行对		五行之义		五行相生		五行五事

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的职责就像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依照顺序予以行使职责,就会实现社会太平,违背顺序行使职责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也就是说,人处在历史中,必须遵奉历史规律,不能悖逆。《春秋繁露·五行变救》:“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当五行的变化没有依照原有的顺序,那就要通过人们自己的修德来救赎,恩泽天下人,就可以消除祸咎。如果一意孤行,没有布德施恩,要不了三年,天神就会下石头予以警告。“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者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比如火发生了变故,冬温夏寒的反常气象,那就表明社会出问题了。有功劳的没有得到奖赏,有罪恶的没有得到处罚。无德无才的人占据了领导地位,贤能者归隐山林。救赎的办法,就是举贤才,奖赏有功的人。可见,五行的观念依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延续和细化。

阴阳。所谓阴阳是指构成事物中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董仲舒以此为据来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现象。一是用阴阳关系来解释三纲。《春秋繁露·基义》:“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二是用阴阳解释德刑关系。《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故刑者德之副,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阳是一年岁月中的主管,阴要辅助阳来成事,刑罚要辅佐德政来执政。“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阴阳的奴主关系,是自然生成的。三是用阴阳解释历史的发展。《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与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将阴阳作为事

物发展的顺序和悖逆两种趋向,即可以把握其发展的大势。大小、强弱、贤与不肖和善恶等,都有其阴阳作为底蕴和基础的。阳大致代表着顺畅的发展,阴代表着逆反的发展。可见,阴阳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源。《春秋繁露·阴阳出入》:“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而阳入,阳出而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并行而不相乱,浇滑而各持分,此之谓天之意。”自然发展的趋向,是阴阳不能同时出现。从时间上说,春天是阳气生发而阴气隐匿,秋天是阴气生发而阳气隐匿,夏季是阳气浓郁而阴气稀薄,冬季是阴气浓郁而阳气稀薄。阴阳互相转化,促使四季的变化。《春秋繁露·阴阳位》:“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故阴阳终岁各一出。”阴阳转化一周是一年。从空间上说,在一年中阳气由东北、南、西再到北,阴气由东南、北、西、南,这样,阳是以南方为其位,阴是以北方为其位。由此可见,阴阳观念不仅能够说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而且也能说明其空间方位。总之,阴阳不仅构成人类历史的内核,也是认识人类历史的锁钥。

在讨论历史认识的方式、范畴的同时,董仲舒还对历史认识的检验予以了论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所以真物也。”事物的名称源自于事物自身的属性,没有其属性,就不会用相应的名称。可见,任何名称都是圣贤对于事实的认识结果。这就是说,任何历史见解都是学者从历史事实的认识中得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的。换句话说,历史认识的正确与否,都需要历史事实来予以体验。从董仲舒的论述看,历史认识的检验方式,有以下形式。一是通过历史事实予以考察。《春秋繁



露·竹林》：“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泰山虽然巨大，但是不观察是看不见的，何况如历史规则那样的微妙东西呢，更需要观察体验。《春秋》所记载的历史，都是尽量探究其缘由并仔细观察其效果的。所以，后来者如果想实现理想、成就事业的人，都应该谨慎地予以借鉴。可见，《春秋》所得出的历史观点，都是经过历史事实验证的结论。《春秋繁露·楚庄王》：“孔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孔子非常赞赏舜能够承继尧的政治传统，实现了无为而治的局面。董仲舒认为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不可改变的政治经验。二是通过学术讨论予以澄清。《春秋繁露·仁义法》：“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美味佳肴需要品尝才能知其味，卓见高论需要讨论才能领悟其真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知之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以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只有圣贤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给予正确的名分。圣贤所提出的意见，社会上的人们都以为是正确的。俗话说，了解早晚要看北斗星，辨别是非就看圣贤。可见，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圣贤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分别历史认识是非的标准。三是通过政治实效予以考核。《春秋繁露·保位权》：“挈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施，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政治实践中，君主可以根据职位职责及其实际工作予以考核，奖励罚过，注重实效。这样，既可激励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又可以遵从无为之治的规则。而作为历史研究，亦可借此考察其时的历史进程并给予合适的评价。

#### 四、“善善恶恶”的史学方法论

在董仲舒这里，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历史认识的形式，而且也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

天人合一讲究的是顺从历史规律，即依照历史发展的秩序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在历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论讲究的是根据历史事实来看待历史，尽量减少研究者主观的情感。由此，两者便有了自然的耦合。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善善恶恶”。《春秋繁露·楚庄王》：“吾以其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

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董仲舒认为自己看透了孔子，他身边的就写得详细，距他远的就写得省略，好的就写好，坏的就写坏。由此可以推知，他对显贵的就写出其显贵、卑贱的就写出其卑贱、重要的就写出其重要、次要的就写出其次要。也能推知，仁义厚重的就写出厚重，浅薄的就写出浅薄，善良的就写出善良，丑恶的就写出其丑恶。还能推知，属于阳性的就写出其阳性，属于阴性的就写出其阴性；属于金的就写出其白色，属于水的就写出其黑色。总之，历史是什么样子，就照样描述成什么样子。《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记载历史有自身的特征，这就是经常依据客观历史情况而变化叙述方法。当历史发生变化，那么，叙述的方式也变化；当历史如常发展，那么，叙述的方式也不变。《春秋繁露·玉英》：“从贤之志以达其意，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以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孔子编著《春秋》，按照历史本来的样子，如果实际上是善的，那么在记述中也撰写成善的；如果实际不善，那么在记述中也不写成恶的。所以阅读《春秋》，一定要注意到善恶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可见，“善善恶恶”笔法，就是事实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是符合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的。《春秋》记载齐桓公，只讲“即位”，没有称他为“王”。原因齐桓公篡弑其兄，自己不好意思称王。但是毕竟他登上了王位。所以，《春秋》“从其志以见其事也”。《春秋繁露·精华》：“《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史学研究历史，有固有的方法论，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做出应变。“《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对于历史的评价，一定是依据事实并考核其初衷，其初衷邪佞的不考虑其客观的积极效果，其为首的丑恶者一定要严加斥责，其本性憨直者则予以从轻论处。由此，历史主义方法分析问题，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对待的。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正是这个意思。

天人合一的内容是将自然与人类两相对照，要么用自然说明人类，要么用人类说明自然，总之是通过比较来实现的。历史学的研究是一种事实分析，其本质就是比较研究。《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作为历史论著，其叙述大多都是用比较的

形式,所以其言语很简明而道理说得很透彻。《春秋繁露·玉杯》:“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阅读《春秋》,就是综合考察所有的事情,以其本质属性为旨归,将其放在一起比较对照,寻求其相同,删除其不同,即可发现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将夏、商和春秋三个时代进行比较,回答了为什么春秋时代施行的是三等爵制的问题。“春秋何三等?曰: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商代讲究的是内容,信仰天,天有三光,所以施行的是三等爵;夏代讲究的是形式,信仰地,地有五行,所以施行的是五等爵;春秋时代顺从天地,信仰人,所以也施行三等爵。《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利》比较义利对于人生的关系:“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如此比较,显然是通俗易懂,让人容易接受。《春秋繁露·竹林》记载齐顷公事迹,说他在即位初年,傲慢无礼,蔑视四邻。晋、鲁联合曹、卫围攻之,结果做了俘虏。此后,齐顷公发奋图强,伐鲁击卫一雪前耻。董仲舒比较其前后功过,说:“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由此,董仲舒已经将比较研究升华为辩证分析。又如,《春秋》的主旨是讲究爱人的,但是却记载了许多杀人的战争事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董仲舒分析说,战争虽然总体上说是不对的,但是比较来说,有的战争还是值得肯定的。“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战争中的是非错综复杂,用言语是很难讲清楚的,只有深入调查,掌握事实本身,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才能掌握历史的本质。

天人合一注重的是圣贤的先知先觉,希图借助于圣贤的智慧把握历史发展趋向。历史学研究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凭借着代代薪火相传方式才能得以传承发展的。简单说来,历史学的研究,讲究的是承继前人的学术观点,并予以发扬光大。这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讲,就是理论分析法。由此,在圣贤的历史观点上,两者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为此,董仲舒特别看重前人的尤其是儒家的学说,常常借助孔子的话语论析历史。《春秋繁露·重政》:“圣人思虑不厌,昼日继之以夜,然后万物查看,仁义矣。由此言之,尚自为得之哉。故曰:为人师者,可无慎邪!夫义出于经,经

传,大本也。”圣贤们夜以继日地思索考察,才能领悟仁义的真谛。而后将其心得教诲其弟子。做教师需要自己先要谨慎的为人。仁义思想存在于史学论著《春秋》,所以为《春秋》作传疏,是学术发展的最基本形式。《春秋繁露·竹林》叙述宋楚两国相战,楚国围宋城七天还没有攻下。楚庄王派司马子反去查看敌情,宋国华元出城迎见,互相透露实情。当司马子反听说宋城内幽静疲惫不堪,缺粮少物时,毅然退兵,并将剩余的粮食送给宋。从行政角度看,司马子反没有及时向楚庄王汇报擅自做主,“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但是《春秋》却给予很好的评价,“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董仲舒引用孔子的话说:“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繁露·精华》为说明任用贤能的重要:“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据此,任用贤能的重要不言而喻。《春秋繁露·度制》更多引用孔子的话语,说明制度建设中的一些原则,是需要考虑的。如:“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再如:“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都是说执政者不能尽情奢靡和掠夺财富,而应该给民众以恩施和适当的财富。

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借助自然的灾异来警告人应该谨慎,遵奉历史规律,施恩布仁,促进历史进步。由此,天人合一所注重的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史学研究中,虽然历史主义讲究从客观历史进程看待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是以史家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在认识主体性方面,天人合一与史学方法论紧密结合,都注重历史的价值分析。《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孔子编著《春秋》,根据自己的见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亲自所见的即经历的,哀、定、昭三代;第二个是听经历的人所说的,有襄、成、文、宣四代;第三个时期是听传说的,有僖、闵、庄、桓、隐五代。“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在所亲自经历的61年历史中,采用隐晦的语言叙述;在所听到的85年历史中,采用鲜明的语言叙述;而在所传说的96年历史中,采用纯粹客观的语言叙述。总之,在历史叙述中,与自身的情感态度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孔子的历史叙述是采用的价值分析的方法。《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记载历

史,不会将丑恶的事情记载君主名下,也不会将良善的令名归于臣子。因为在贵族君主政治生活中,所有的好事功绩归于君主,所有的害事错咎归罪于臣子。由此可见,《春秋》的价值分析法是与其时的专制君主制密切相关的,是以违背客观历史真实为代价的。

一方面是用历史主义方法讲求实事求是,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一方面是用价值分析法讲求情感好恶,强调研究的主观性。那么,究竟何去何

从?《春秋繁露·楚庄王》:“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春秋》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果能够从中掌握哪怕是一点,只要能够将其理解渗透,弄清其是非,那么,就可以得到史学的真谛。由此,对于董仲舒史学方法论中的矛盾,不能以矛盾视角看待,而是应该以复杂的历史研究视野和孔子优秀史学传统的承继视角看待。

### [参 考 文 献]

-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吴怀祺,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2.
- [4] 白寿彝,徐殿才.中国史学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5] 侯外庐,赵纪彬.中国思想通史·两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7]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8]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9]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On Dong Zhong-shu'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Zheng Xian-xing

(Ha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book *Chunqiu fanlu* embodies hi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roundly. In his opinion, the object of history research is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officials' gain and loss when they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the mission is to distinguish the post and duty of officials at different levels, to examine their political ability and contribution. In other words,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 is politics, and its function is a key to manage national politics, to control future and to express political ideas. History is a process taking the human being as the core, while kindness is the basic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create history. Performing kindness means getting power legally and using power reasonably. At the same time, the talents should be valued and they should show their wisdom and loyalty. Moreover, the system should be created to win the people's support. He proposes that the means to understand history should be the joint of human being and heaven. That is to say, human being should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perience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y b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past. The theory of joint of human being and heave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Wuxing* and *yinyang* and its testing measure includes historical facts,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political effects. In a word, being regarded as folk theory on history, his thought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y research including historicalism, comparison, and value analysis.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Chunqiu fanlu*

[责任编辑:刘太祥]